■纪念郭大力（四）

《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和出版

□郭宝璘 王希和

1940年春，郭大力开始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工作。

《剩余价值学说史》实际上是《资本论》的第四卷。它是由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历史部分编辑而成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完一部经济学手稿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后，从1861年到1863年，又撰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经济学手稿。这个手稿的一部分，后来由马克思重新做了修改和补充，成为《资本论》第1—3卷的内容；这部手稿中有关历史批判部分，也是当时马克思较早写成并整理得最细致的部分，构成了《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把《资本论》前三卷称为理论部分，而把历史部分称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本来准备在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后，立即着手整理这部分手稿。但由于恩格斯年事已高且重病在身，就把这件工作委托给了考茨基。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在整理、编辑马克思的这部分手稿时，没有作为《资本论》第四卷，而是作为一部与《资本论》相独立的著作，以《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书名出版了。

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共120多万字，包括三大册，与前三卷的篇幅所差无几。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围绕剩余价值理论这个核心问题，不仅对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个主要流派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阐述和批判，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许多重要问题有着详尽的论述，是《资本论》前三卷的重要补充，是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郭大力认为，只有把《剩余价值学说史》也全部译成中文，才真正称得上把《资本论》完整地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实际上，他在为自己确定的奋斗目标中，早就把全文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列入自己的计划，并且和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郑易里、黄洛峰等洽谈过此事。但是，他一直腾不出手，只是在《资本论》三卷出版并审校一遍之后，才有可能开始这项工作。由于王亚南另有研究计划，所以，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重担，就全部落在郭大力一人的肩上。



郭大力译《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各种版本（部分）

郭大力翻译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是以考茨基编的、1923年柏林狄茨出版社出版的第五版为依据的。这时的郭大力，与10年前相比，不仅对马克思理论有了较深的造诣，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主要流派的学说已经相当熟悉，而且在翻译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比之下，《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还是比较顺手的。但是，在这段过程中，郭大力遇到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首先是政治上不安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进行任何一种进步活动都要受到迫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更是非法的。这就注定了郭大力在政治生活上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之中。1940年秋，郭大力应广东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的聘请，前往该院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同时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当时，在林砺儒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广东文理学院具有一定的进步自由的风气，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公开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讲授革命理论。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实行高压政策，国民党特务对于学院这种进步自由的学风恨之入骨，使出各种卑劣的手段，大打出手，疯狂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在这种形势下，郭大力不得不与林砺儒等于1941年5月该学期尚未结束时提出辞职，被迫离开学校。从广东到赣南的归途中，不幸又遭到一伙据说与国民党特务相勾结的匪徒的抢掠，所带衣物洗劫一空。为了能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坚持《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工作，郭大力带领全家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潭口乡田心里村——一个离赣州市40里地的偏僻村庄——定居。为时不久，疯狂至极的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魔爪伸向赣南，四处骚扰，杀人放火。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郭大力不得不怀抱译稿，四处躲藏。后来，为了避免遗失，又把译稿用油布包好，埋在菜园里的树底下。抗日胜利后，郭大力在厦门大学教书时，又不时有国民党特务破门而入，使人惶惶不可终日。

其次是生活贫困。从1940年夏到1947年春，将近6年的时间，郭大力回绝一切高薪聘请，一直和家人住在远离城镇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职业，没有固定收入，全家生活靠着读书生活出版社偶尔寄来的版税和他间或发表的小文章的稿费来维持。尽管农村生活费用很低，自己又在房前的小园子里种点菜蔬，勉强可以维持最低的基本生活。但家里经常窘困到连买油盐柴米的钱都没有，吃肉更是数月难得一次。生活的清贫，可见一斑。

再次是工作条件恶劣。住在乡下，收入少且不固定，维持最低的生活有时都成问题，工作条件自然也极差。全家4口人吃饭、睡觉的小层，同时就是郭大力的工作室。在那光线不足的小房间里，他忍受着苍蝇、蚊子、臭虫、跳蚤的袭击，守着一盏昏暗的小桐油灯，一直工作到深夜。天天如此，从不中断。工作环境的恶劣，清贫惯了的郭大力尚能忍受，最使他感到苦恼的是，翻译中遇到问题无人切磋，没有必要的参考书籍和资料，甚至连一本较好的德文辞典也没有。真是困难重重。

但是，困难并没有使郭大力动摇、退缩。他执着的循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前进，以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埋头苦干，坚持《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工作。1943年11月，郭大力终于将马克思这部120余万字的巨著译完，后来又用数年时间对译文做了反复的修改、校订。由于时局混乱，一时无法出版。

1947年底，读书生活出版社决定出版《剩余价值学说史》。听到这个消息，郭大力欣喜万分。他在1948年春给郑易里的信中写道：“接到（黄）洛峰兄的信，知道出版社决定将《剩余价值学说史》付印，这自然使我十分高兴。这不但实现了诸兄的志愿，亦算实现了我的志愿。此书翻译，始于1940年春，完于日本投降的一年。在翻译的过程中，我饱尝了种种辛苦。尤其是快要完成的一年。那时，日本兵来扰我的故乡，我所受的苦尤大。”后来，郭大力又写道：“《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翻译，是开始于1940年春。但在译稿的最后一页，我能写着这样的字句：‘1943年11月17日译完初稿。’从那时起，我不断为原稿的校订而努力。现在，这个努力的成果，总算可以拿来公诸于世了。在这里，如果我一味说这个工作曾经是如何艰苦，那是近于夸大的。当然，那对于我是艰苦的。原著篇幅浩瀚，它的理解一部分是困难的。我总是恐惧着，这样一个译本不免要把原著玷辱了。”

为了使《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排印、出版更为顺利，郭大力又对译文做了一次全面的校订、并全部誊写一清（原来的译稿是在农村用土纸写的）。他还对全书的排版格式、装帧式样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剩余价值学说史》是在国统区上海秘密排印的。据具体负责该书编辑、出版工作的范用回忆，当时，郭大力由福建厦门分批寄来《剩余价值学说史》译稿，100多万字，不到一年就全部由一个仅有几名排字工人的小排字房排好，打成纸型，又向印刷厂借了300多令报纸印成书，全部装箱存入银行仓库，准备上海一解放就可以取出发行。1949年5月，三卷四册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文全译本，在上海解放前夕，由读书生活出版社以实践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出版。一个月后，又由三联书店再次出版。后来，这个版本多次重印。

从1928年到1949年，郭大力前后一共用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宏愿，把字数多达300余万字的三卷《资本论》和三卷《剩余价值学说史》全部译成中文，使马克思的这部巨著完整地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书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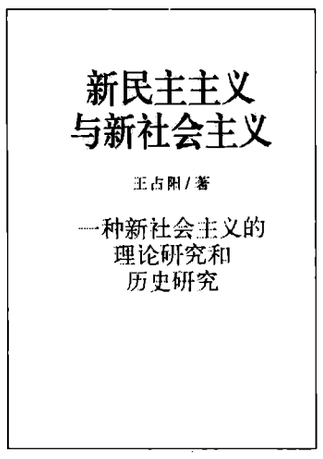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一本新书的社会主义新论

□陈铁健

一、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理论难题，关于社会主义的最一般的本质特征，本书提出了新的观点

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也是世界关注的理论难题。什么是社会主义？众多的理论家们已经给出了至少几十种社会主义定义。新近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一书对社会主义的最一般的本质特征做出了新的探索和回答。作者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和研究，提出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大家好”，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最一般的价值取向，就是公民的普遍幸福。”按照这个普遍原则，才能合乎逻辑地阐明为什么普遍的效率、公平、富裕、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等都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譬如，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只能是普遍富裕的而非普遍贫困的经济，为此，它必须同时具备效率和公平这两个基本特征。又如，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只能是公共权力的公有化，而绝不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或利益集团私有化。本书指出：“人民民主权力的核心是选举和撤消国家干部”。“干部制度的根本原则就应当是主人管公仆，人民管干部，而不应当是公仆管公仆、干部管干部”。“‘党管干部’自然就应当被理解和界定为党领导、支持、帮助、保障人民管干部，而不应当只有党有权管干部，而人民却无权管干部”（该书第24页）再如，作为人类天赋要求的自由，它与富裕一样，也是人生幸福的一个基本来源。恩格斯说：“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961年版，第18页）得到满足，人就会产生幸福感。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要实现有规则的普遍自由；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化。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深厚人性基础的社会政治系统。人的善良本性的实质在于希望他人获得幸福，并以自己的行动为他人谋幸福，是对所有人的善良（只要他不是害群之马）。社会主义就是人类良心博爱之所在，社会主义者就是真正的好人。社会主义深藏于人的良心中，因而人人都是潜在的社会主义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总之，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抓住这两条，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就能彻底摒除一切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刻板观念，就能看到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普遍存在和长期发展，就能重建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和信念，就能更加准确地确定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本书从“普遍幸福”这个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出发，明确提出重建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十六大报告最后一句话讲“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无疑是把握住了“普遍幸福”这个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本书作者从这一最高价值出发，明确提出重建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凡属结构性质（组织、制度、体制、规范等）的东西，只有它具有普遍幸福主义的功能的时候，才是社会主义的。经过实践的检验，一切不利于普遍增进人民幸福的，都是不具备普遍幸福主义功能的，因而也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盲目地崇拜结构、坚守结构，忽视社会功能，必然导致空想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全球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主要潮流。在中国，以实事求是为灵魂，包括“猫论”、“三个有利于”等在内的邓小平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科学的实质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虽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很大不同，但因它也是实事求是的普遍幸福主义的学说，所以它当然也是一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作者认为时代性质不同，社会主义就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曾经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大问题。资本主义仍将具有长期的发展余地，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判断。邓小平以深远的历史眼光估量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奋斗。“几十代”究竟有多久？孔子家族已传至七十余代，历经2500余年。邓小平已经对于过低估计资本主义生命力的问题，给予了彻底的解决。从世界历史的长河看，区别于旧资本主义的现代资本主义，还将拥有其历史的活力。当今的时代不仅是资本主义继续向上发展的历史时代，而且同时也是新社会主义向上发展的历史时代，而在总体上，则就是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的现代文明时代。在这一历史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作为资本主义的完全替代物的社会主义，而只能实行、也应当实行作为资本主义的部分替作物的新社会主义。发达国家的特征之一也正是拥有新社会主义的因素。在这一历史时代，“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假马克思主义已经失效了，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则正在重新焕发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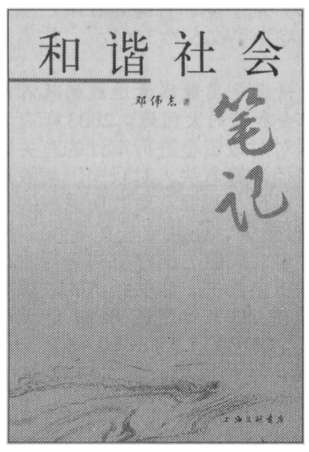
三、本书还探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各自适用范围和合理界线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发展战略问题。在这方面，时至今日，某些理论家和实行者那里，思想仍然处于混乱状态。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明晰的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现在最需要的，实际是要重新认识和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将教条主义的、古代注经式的、以理论文本为主要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变为面向实际的、活生生的、以经验事实为主要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显然也应当以此为重点。请记住恩格斯的话吧：

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王占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

邓伟志《和谐社会笔记》出版



在日前举行的上海市政协常委会上，市委副书记刘云耕称赞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撰写的《和谐社会十二条》。

邓伟志长期致力于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早在1991年就在《社会科学（上海）》上提出了“社会平衡”论，他说“社会平衡是一门大学问”，要“把握社会平衡的适度”。1995年又在《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文，表示了对“社会发展滞后”的焦虑。可是，十年来经济这条腿越来越长，社会这条腿越来越短。于是，邓伟志教授又做了更细致深入的研究，撰写了三十余篇文章。

《和谐社会十二条》是邓伟志《和谐社会笔记》一书的浓缩。《和谐社会笔记》近日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上海第一本有关和谐社会的书籍。邓伟志1月3日发表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的《论“和谐社会”》一文，已为《新华文摘》第6期转载。

（朱慧君）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思想与历史的智慧：深刻认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内涵

——刘少奇的党建思想（二）

□侯且岸

我们说，党的建设的关键是思想理论建设，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问题，但需要进一步解析的问题在于：对思想理论本身及其作用（吸纳外来的思想理论）应当有怎样的认知？如何才能解决好“知行”关系问题？

我一直认为，我们所熟识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究，需要紧紧围绕着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定背景，需要借助于中国的思想资源。我想到，孙中山就尤其重视认识论在党（国民党）的思想建设（心理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将“知行”问题作为心理建设的关键。他曾经从反思的角度告诫国民党员：辛亥革命以后多年的事实与其初衷完全相悖，“本可从此继进”，但其主张却难“有效而见之实行”。那么，其原因何在呢？孙中山认为：“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引者注：此说出自《尚书》）之说也”。因此，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集中分析和批判了所谓的“知易行难”之说，鲜明地提出了“知难行易”的反题，从而引发了多年的争论。

我认为，从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着眼，其最深刻的内涵就是如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刘少奇一直十分关注着这一具有知行意义的“难题”。在他看来，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党的思想理论准备不够”另一个就是党内有“假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于后者，刘少奇评论道，“对于这种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假布尔什维克，是不能仅仅从他们的词句，从他们表现的形式去识别的。他们可以在言语上表现得比什么人都有更多马列主义，在形式上也可以表现的比什么人都更革命，然而他们最怕实践的考验，最怕用批评的精神去检查他们的工作。”（《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因此，他要求全党，“在整风的基础上，进而总结我们二十二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思想体系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残余，把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高到更高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在党的建设上今天的中心任务。”（同上，第376页）

在研究中，我发现：刘少奇在分析问题和阐述理论见解时，非常看中的就是联系历史，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历史中展开思想，从历史中总结教训，将历史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这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认知方法之一。在《中国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刘少奇借着分析“党的理论准备不足”问题，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欧洲人，讲的是欧洲话，用欧洲文字写书，讲的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情，也讲到中国的事情，但讲得很少，所以现在把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来，不是翻译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变成中国字，而且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今天看来，刘少奇的这段话是何等明智、绝妙！他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命题（按时下普遍的说法是“提法”），而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理路（包括方法），一条赋予历史智慧的认知理路。

1948年7月，刘少奇同当时马列学院的学员深谈理论学习的方法和要求，他特别告诉学员：“我们学习，不仅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外国的实际；不但要研究现在的实际，而且要联系历史的实际”。而当有人对要求学西方史提出疑问时，他明确地回答：“不学不行。因为学习西方历史是为了读懂马列主义”（《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36页）。

行文至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现时中已成定型范式的党的建设及其理论研究。如果说这种研究迫切需要注入理性成分的话，那么最应优先考虑的就是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要努力使已经被“习惯性”分离的“党史和党建”能够重新整合起来。顺便说一下，我在给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界定其研究对象时就试图全力突出这种整合。对于研究对象，我是这样表述的：“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文化嬗变的特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和建设的历史过程，它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应当说，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对象的界定上，特别强调党自身发展和建设的历史过程，得益于刘少奇的启示，也直接针对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